

浅评《话语体系：讲好管理学术创新的“中国话”》^①

吴晓波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摘要: 中国管理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需要注重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这其中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同时,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不等于“造新词”,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互文性”问题。建设学术话语体系,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大力发展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质性研究;在学界形成理性批判的风气;通过大力发展“人文教育”培养中国管理学术精英人才。

关键词: 话语体系; 重构; 管理研究; 中国情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07(2019)06-0015-03

0 引言

盛昭瀚教授在《话语体系：讲好管理学术创新的“中国话”》(下文称《话语体系》)一文中指出,在推进管理学术中国化的进程中,学者尤其需要注重构建与我国世界性大国管理学术地位相称的话语体系,即要讲好中国管理学术的“中国话”。此文系统地说明了构建管理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性、我国管理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现状以及进一步发展的原则要点与“抓手”,文章一气呵成,意义重大。应编辑部之邀,本人不揣谫陋,尝试对其作出一二点评与补充。

(一)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是发展我国管理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大挑战

正如盛教授所言,“语言是话语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与话语是人类交流的基本工具,这也意味着,语言与话语只有在被广泛采用的基础上,才能够产生价值。1887年7月26日,28岁的波兰籍犹太人语言学家柴门霍夫基于印欧语系创立一门新的语言——“世界语”。世界语甫一诞生即受到了全球有识之士的认可,其中也包括中国的胡适、陈独秀、林语堂等人。但是,一个

多世纪过去了,“世界语”却没有成为“世界的语言”,至今仅2 000人将其当做母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影响力十分有限。事实上,我们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也面临着类似于发展“世界语”类似的两难情形:一方面,由于现在的话语体系高地已被西方把控多年,如果我们过于强调“民族性”,搞自己的“窄轨铁路”,就失去了“语言”与“话语”的本质意义,“闭门造车”显然行不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世界性”,就仍然局限于盛教授所言“跟着讲”的现状,可能进一步深陷“追赶陷阱”而不能自拔。二者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如何在兼顾“民族性”与“世界性”中前进?这是一个很复杂、需要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

(二)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不等于“造新词”

管理话语表达的基础是“概念”,由于这些“概念”多数是由学者们从现实实践中抽象、归纳出的,所以又常称作“概念”,比如“动态能力”、“破坏式创新”、“组织惰性”等。管理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门受到情境深刻影响的科学。因此,对于建立于西方实践及其相应话语体系下的现有管理理论,它们的确常常对于中国管理实践

① 收稿日期: 2019-06-10; 修订日期: 2019-06-24。

作者简介: 吴晓波(1960—),男,浙江杭州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Email: xbwu@zju.edu.cn

缺乏解释力,因而也就需要我们从中国管理实践的情景中提炼出具有属性深度的新概念,形成构建更具普遍性的管理学新话语体系的新基石。然而,我们在创造新构念的过程中一定要“慎之又慎”,秉持“奥卡姆剃刀法则”,如果不是非常必要的(即利用已经有构念已经可以很好地刻画的),就不必创造新词。在现今中国管理学术圈,的确有一种“攒造新词”以哗众取宠的不良风气,它看着热闹,但事实上对于我国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其实有百害而无一利,应予以理性克制。

(三)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要考虑语言之间的“互文性”问题

正如中国独特的管理实践可以催生独特的管理理论,我们的语言——汉语,由于其富含“缄默知识”,在许多方面也具有天然的独特性,这是我们发展管理学术话语体系不能忽视的特点。许多汉语词汇在英文(及其他印欧体系的西方语言)中是很难找到准确的对应者(比如“关系”、“悟”、“道”、“阴阳”等),而往往恰恰是在这个方面,蕴藏着我们发展独立话语体系并同时能够得到西方尊重、认同的机会。

基于以上特征,本文尝试提出3点进一步的建议:

(1)大力发展扎根中国管理实践的质性研究

目前在管理学领域主要存在两种研究范式:以案例研究、访谈研究等为主的“质性研究”范式,以及以计量经济学方法为代表的“定量研究”范式。两种范式各有所长,并无优劣之分:“定量研究”范式更加擅长于通过数据较为严谨的分析方式,验证从已有的理论出发提出的理论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管理现象;而“质性研究”除了也可以用于理论验证之外,更加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从管理实践中凝练归纳出抽象的新理论、新概念。盛教授在《话语体系》一文中提出要“讲好中国管理故事”、“凝练标识性新概念”,而这一目标的达成离不开扎实的“质性研究”。

大力发展质性研究以促进管理学术语言体系构建,一方面需要学者们扎根中国管理实践,通过长期、深度的跟踪观察积累第一手资料,真正“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另一方面也需要学者们提高自身的学养,加深理论功底与学术分析和写作水平,只有“站在巨人的臂膀上”并深入“中国

情景”,才能够凝练出新的“构念”,把“中国管理故事”讲得透彻、讲得有趣,上升为可能的“中国学说”。

(2)在学界形成理性批判的风气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有目的、反思性的思维过程,包括“怀疑”与“验证”两个主要流程。学者们拥有的“批判性思维”是现代科学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凝炼能够为世界所接受的“中国学说”的前提,自然对于我国管理学术体系(包括“话语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应该看到,我国管理学界目前存在着较重的追求“网红效果”的倾向,“非理性批判”普遍存在,常常“批而不判”,且“语不惊人死不休”,具有很强的社会危害性。

一类典型的常见例子,就是通过极端化的论点和观点吸引“流量”。现实当中,常见有“学者”、“权威”用唐·吉珂德大战风车的精神树立一个“莫须有”靶子,通过把“对手”的观点和立场推到一种极端、甚至荒谬,借以“证明”自己的正确,甚至对“对手”给予疯狂的鞭笞。诸如,“服务业就是投机占便宜”、“制造业已经过时了”;“定性研究完全没有普适性”、“定量研究就是操纵数据”;“产业政策就是反市场经济”、“政府重点发展XX产业就是不惜代价”,“MBO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诸如此类,比比皆是,不一而足。

另一类典型则是,自己并没有真正深入、扎实地把相关经典理论搞明白,就旗帜鲜明地急着对经典理论“大张挞伐”,发出各种无妄的感慨,或者“尖锐批判”。例如,拿某个国际权威学者的后期“新”理论去批判此学者的早期理论;拿此情景去批驳彼情景;拿此学者对互联网情景下的研究新进展去批判此学者30多年前提出的经典理论,等等,以此来证明自己伟大的“独到见解”。特别是,许多所谓的新概念、新观点其实早就有学者提出过、研究过,只不过眼下的提出者自己“学艺不精”,不知道也不想花工夫去知道,却摆出一付“神明”的架势,不仅大声,而且“大牌”……凡此种现象也是普遍。

学者要有批判的理性,但前提是要有批判的能力。这就需要在认真、系统、虚心学习借鉴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同时,深入中国的企业,以国际的视野,用科学的方法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研究事物的真正科学规律。学界形成建设性

理性批判的风气,首先要通过充分的平等交流与建设性互动,对学界存在的“非理性”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形成学术界既尊重权威又不迷信权威、既尊重经典又勇于创新的新局面。

(3) 大力发展“人文教育”,着力培养中国管理学术精英人才

构建与发展我国管理学术话语体系,归根到底得靠拥有科学精神的人才。管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既涉及人文知识,又需要科学修养。科学知识表达的是人们内心之外的客观世界,它首先需要我们学会并践行客观地观察事物。人文知识表达的是我们内心对世界的感受和体会,需要深度的内心感知能力,甚至“悟性”。目前来看,我国已经拥有了一大批具有过硬科学修养的管理学者,他们已经可以在管理学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但是,坦率地说受囿于已有西方理论范式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做修修补补地将西方理论在中国作“验证”的研究占了相当多数。相对来说,在管理学教育上仍有所欠缺的是人文教育,只有既具有人文关怀、悲悯情怀,又具有独立意识、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管理学者,才能在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革的中华崛起时代奏出时代的强音。

总之,构建与我国世界性大国管理学术地位相称的话语体系,必须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基础上的“中国话”,而不是中国学者自己关起门来“自

力更生”,更不是自己搞个独特的平台或者规则。我们需要并且也能够与其他国家的实践界和学术界一起,共创、共建、共享“中国话”。“中国话”不仅仅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而是属于全人类、全世界的话语体系。

构建与我国世界性大国管理学术地位相称的话语体系,意味着与原有的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的冲突甚至对抗,这是一个从连续到非连续、从线性到非线性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要充分发挥更为主动积极深入实践的健康作用,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发展脚踏实地添砖加瓦。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致力于为学术界营造生动活泼、百花齐放的良性局面,允许有各种大胆的创新尝试和探索,通过改革破除职称评定、学术待遇等方面僵化的“体制机制瓶颈”,抛弃一些不合时宜、故步自封的形式主义做法,真正将破除学术“五唯”落到实处。我们需要将“中国话语体系”的创造性学习与“忘却学习”充分结合起来,同时应当充分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抓住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全球性重构的重大“超越追赶”之战略机会窗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推动甚至引领全球管理学术界话语体系的新发展。

A comment on “Restructuring discourse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with Chinese context”

WU Xiao-bo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advance the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 with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academic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ontext. To do so, on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issues is to coordinat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universality. In the meanwhile, advancing or restructuring discourse of management knowledge is by no means of merely creating “fancy phrases”, we nee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management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especially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to deriv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for establishing a more inclusive knowledge system of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put more efforts on the qualitative studies rooted in Chinese business practice, on the cultivation of scholarly critical thinking, and on the enhancement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o develop academic elites in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academic discourse; restructuring; management study; China context